

文化  
中国  
与世  
CULTURE  
CHINA AND  
THE WORLD  
新论

甘阳  
主编

吴飞 著

# 自杀作为 中国问题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甘阳 主编

---

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

---

\*

**自杀作为中国问题**

吴飞 著

---

Copyright © 200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杀作为中国问题 / 吴飞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11

(文化: 中国与世界新论)

ISBN 978-7-108-02711-5

I. 自… II. 吴… III. 自杀-社会问题-研究-中国  
IV. D66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5676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092 毫米 1 / 32 印张 4.25

字 数 68 千字

·印 数 0,001 — 8,000 册

定 价 14.00 元

## 缘 起

百年前，梁启超曾提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以及“世界之中国”的说法。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世界之中国”或“亚洲之中国”的各种说法益发频频可闻。

但所谓“中国”，并不仅仅只是联合国上百个国家中之一“国”，而首先是一大文明母体。韦伯当年从文明母体着眼把全球分为五大历史文明（儒家文明，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的理论，引发日后种种“轴心文明”讨论，至今意义重大。事实上，晚清以来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从未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简单看成是中国与其他各“国”之间的关系，而总是首先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成是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

特别是强势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二十年前，我们这一代人创办“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时，秉承的也是这种从大文明格局看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视野。

这套新编“文化：中国与世界”论丛，仍然承继这种从文明格局看中国与世界的视野。我们以为，这种文明论的立场今天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迫切了，因为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将消解所有历史文明之间的差异，绝不意味着走向无分殊的全球一体化文明，恰恰相反，全球化的过程实际更加突出了不同人民的“文明属性”。正是在全球化加速的时候，有关文明、文化、民族、族群等的讨论日益成为全球各地最突出的共同话题，既有所谓“文明冲突论”的出场，更有种种“文明对话论”的主张。而晚近以来“软实力”概念的普遍流行，更使世界各国都已日益明确地把文明潜力和文化创造力置于发展战略的核心。说到底，真正的大国崛起，必然是一个文化大国的崛起；只有具备深厚文明潜力的国家才有作为大国崛起的资格和条件。

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曾经预言：人文社会科学的21世纪应该是中国的世纪。今日中国学术文化之现状无疑仍离这个期盼甚远，但我们不必妄自菲薄，而应看到这个预言的理据所在。这个理据就是张光直所说中国文

明积累了一笔最庞大的文化本钱，如他引用 Arthur Wright 的话所言：“全球上没有任何民族有像中华民族那样庞大的对他们过去历史的记录。二千五百年的正史里所记录下来的个别事件的总额是无法计算的。要将二十五史翻成英文，需要四千五百万个单词，而这还只代表那整个记录中的一小部分。”按张光直的看法，这笔庞大的文化资本，尚未被现代中国人好好利用过，因为近百年来的中国人基本是用西方一时一地的理论和观点去看世界，甚至想当然地以为西方的理论观点都具有普遍性。但是，一旦“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倒转过来以中国文明的历史视野去看世界，那么中国文明积累的这笔庞大文化资本就会发挥出其巨大潜力。

诚如张光直先生所言，要把中国文明的这种潜力发挥出来，我们需要同时做三件事，一是深入研究中国文明，二是尽量了解学习世界史，三是深入了解各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有了这三个条件我们才能知所辨别。做这些工作都需要长时间，深功夫，需要每人从具体问题着手，同时又要求打破专业的壁垒而形成张光直提倡的“不是专业而是通业”的研究格局。这套丛书即希望能朝这种“通业研究”的方向作些努力。我们希望这里的每种书能以较小的篇幅来展开一些有意义的新观

念、新思想、新问题，同时丛书作为整体则能打破学科专业的篱笆，沟通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着重在问题意识上共同体现“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西方，重新认识古典，重新认识现代”的努力。

之所以要强调“重新认识”，是因为我们以往形成的对西方的看法，以及根据这种对西方的看法而又反过来形成的对中国的看法，有许多都有必要加以重新检讨，其中有些观念早已根深蒂固而且流传极广，但事实上却未必正确甚至根本错误。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例如，就美术而言，上世纪初康有为、陈独秀提倡的“美术革命”曾对 20 世纪的中国美术发生很大的影响，但他们把西方美术归结为“写实主义”，并据此认为中国传统美术因为不能“写实”已经死亡，而中国现代美术的方向就是要学西方美术的“写实主义”，所有这些都一方面是对西方美术的误解，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现代美术的误导。在文学方面，胡适力图引进西方科学实证方法强调对文本的考证诚然有其贡献，但却也常常把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引入死胡同中，尤其胡适顽固反对以中国传统儒道佛的观点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的立场更是大错。例如他说“《西游记》被三四百年来的无

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认为儒道佛的“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敌”，但正如《西游记》英译者余国藩教授所指出，胡适排斥儒道佛现在恰恰成了反讽，因为欧美日本中国现在对《西游记》的所有研究成果可以概观地视为对胡适观点的驳斥，事实上，“和尚，道士和秀才对《西游记》的了解，也许比胡适之博士更透彻，更深刻！”

同样，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认识仍然远远不够。这里一个重要问题是西方人对自己的看法本身就在不断变化和调整中。例如，美国人曾一度认为美国只有自由主义而没有保守主义，但这种看法早已被证明乃根本错误，因为近几十年来美国的最大变化恰恰是保守主义压倒自由主义成了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具有广泛民众基础而且有强烈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倾向的美国保守主义，几乎超出所有主流西方知识界的预料，从而实际使许多西方理论在西方本身就已黯然失色。例如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预设之一是所谓“现代化必然世俗化”，但这个看法现在已经难以成立，因为正如西方学界普遍承认，无论“世俗化”的定义如何修正，都难以解释美国今天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自称相信宗教奇迹、相信上帝的最后审判这种典型宗教社会的现象。晚近三十年来是



西方思想变动最大的时期，其变动的激烈程度只有西方 17 世纪现代思想转型期可以相比，这种变动导致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在被重新讨论，所有的基本概念都在重新修正，例如什么是哲学，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今天都已不再有自明的答案。但另一方面，与保守主义的崛起有关，西方特别美国现在日益呈现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背道而驰的突出现象：知识精英的理论越来越前卫，但普通民众的心态却越来越保守，这种基本矛盾已经成为西方主流知识界的巨大焦虑。如何看待西方社会和思想的这种深刻变化，乃是中国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今天我们已经必须从根本上拒斥简单的“拿来主义”，因为这样的“拿来主义”只能是文化不成熟、文明不独立的表现。中国思想学术文化成熟的标志在于中国文明主体性之独立立场的日渐成熟，这种立场将促使中国学人以自己的头脑去研究、分析、判断西方的各种理论，拒绝人云亦云，拒绝跟风赶时髦。

黑格尔曾说，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近百年来我们过于迫切地想把自己纳入这样那样的普遍性模式，实际忽视了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同时，我们以过于急功近利的实用心态去了解学习西方文明，也往往妨碍了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西方文明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21 世纪

的中国人应该已经有条件以更为从容不迫的心态、更为雍容大气的胸襟去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

承三联书店雅意，这套新编论丛仍沿用“文化：中国与世界”之名，以示二十年来学术文化努力的延续性。我们相信，“文化”这个概念正在重新成为中国人的基本关切。

甘 阳

2007 年中秋于杭州

## 目 录

### 无言的游魂

“理解自杀”札记之一\_\_\_\_\_ 1

### “唯一的哲学问题”

“理解自杀”札记之二\_\_\_\_\_ 17

### 自杀作为中国问题

“理解自杀”札记之三\_\_\_\_\_ 33

### “为生民立命”是否可能

“理解自杀”札记之四\_\_\_\_\_ 49

### 改造人心的政治

“农家女”农村妇女健康支持小组评估\_\_\_\_\_ 65

### 死也要活着

对余华《活着》的一种解读\_\_\_\_\_ 90

理解自杀与文化反思（代跋）\_\_\_\_\_ 113

## 无言的游魂

“理解自杀”札记之一

2002年，客居中国近二十年的加拿大医生费力鹏（Michael Phillips）和他的中国同事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上发表了《中国自杀率：1995—1999》（Suicide Rate in China: 1995—1999）一文，正式向世界公布，中国的自杀率已达十万分之二十三（大约相当于美国的两倍），中国一夜之间变成了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同年年底，费力鹏大夫又在回龙观医院主持成立了“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一时之间，自杀问题成为继艾滋病问题之后，整个世界关注的又一个中国问题。费力鹏大夫对中国所做的贡献，恐怕不亚于他的同胞白求恩大夫。

首先吸引了海内外自杀学家（suicidologist）的，并

不仅仅是这么高的自杀率，而是中国自杀的特殊模式：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妇女自杀，那么多农村人口自杀，那么多年轻人和老年人自杀，而不像西方大多数国家那样集中在男性、城市、中年人？这里面表现出的差距，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分布问题。自杀集中于男性、城市和中年人，都可以从涂尔干的经典自杀理论获得解释：因为这些人更容易遭受社会失范的冲击，更大程度面临现代性所带来的异化、孤独、疏离群体这样的问题。而现代社会中年轻的农村妇女自杀，这是使涂尔干的自杀理论，甚至他的整个关于现代性的判断，都有些手足无措的现象。

尤其让西方的自杀学者感到困惑的是，中国的自杀者中只有 63% 的人患有精神疾病，而不像西方多数国家那样至少有 90%。如果说中国的自杀与精神病完全无关，63% 并不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但是，如果像西方精神医学那样把自杀与抑郁症紧密相联，这个比例又不够大。

中国的自杀现象既不能恰当地归入涂尔干所讲的三种类型，又不太像是来自精神医学所讲的抑郁症，那么，这个现象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有什么样的理论，能给中国的自杀问题一个社会科学的解释，从而可能找到“干

预”或“预防”的人手点？

有些自杀学家指出，中国的抑郁症患者远比想象的多，63%这个数字源于错报或漏报。中国的自杀问题，和别国的自杀问题没什么不同，完全是一个精神医学问题。因此，普及和发展精神医学知识，是解决自杀问题的必由之路。还有学者认为，由于农药这种自杀工具极其烈性，很多本来应该归于自杀未遂的案例因无法抢救，而变成了自杀成功。其实，中国真正可以算作严格意义的自杀的案例并不多，是农药的烈性和医疗条件的恶劣无意中造成了自杀率高的假象。而中国所谓的妇女自杀率高，其实质是妇女自杀未遂率高，而这本来是世界上的普遍现象。基于这样的判断，甚至有人敦促中国农业部改善农药的生产和储存，以此来避免自杀未遂的意外致死率。当然，更具有社会科学修养的学者也会指出，中国年轻的农村妇女自杀率高，完全是因为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依然低下，性别歧视依然严重。

就在自杀学诸公争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我正被困在华北一个拥挤的县医院的急诊室里，一边等待前来就诊的自杀未遂者，一边失望地翻看着他们的治疗记录。这是我对中国自杀现象的人类学研究处在最低谷的时候。

在治疗记录的病因栏里，隔不久就可以看到“农药

中毒”、“甲胺磷中毒”、“1605 中毒”、“氧化乐果中毒”的字样。如果不是在夏天，所有这些都是自杀案例；但如果是在夏天，那你就很难判断，这究竟是服食了农药，还是在田间作业的时候不小心喷在了身上。虽然几乎每一两天就会有“喝药”的病人来到急诊室，但是，没有一个人的病因写的是“喝农药”或“自杀”。虽然我可以判断出大多数自杀未遂者，但是，这个急诊室里最让我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他们从来不区分“自杀”与“误喷农药”，或者说，为什么他们从来不把占患者总数三分之一以上的自杀者当作单独一类的病人？费力鹏那里的统计数字，在他们这里究竟有什么意义？在县医院的医生看来，自杀与车祸、天灾、事故没有什么不同。而他们所负责的，只有洗胃。在他们这里，“自杀”并不是单独的一类事件。那么，这是不是因为他们不是精神科的大夫呢？

幸好，这个县里已经成立了一个精神病诊所。但这个诊所里的状况反而让我更加疑惑。精神科医生所关心的，似乎仍然和自杀者所关心的不是一码事。不仅绝大多数自杀未遂者或有自杀意念的人不会来这个诊所看病，而且，即使来了的人，也总觉得没有什么大的收获。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感到失望了。我最先来到这个

县，并没有到县医院，而是直接找到了公安局。那里的法医给我看了五六年间非自然死亡的记录，并且逐个解释调查和侦破的结果。其间确实有不少自杀者。他告诉我，每当县里发现一具无名尸体，或是出现了一起恶性死亡事件，公安局都要派人调查，并且会留下记录。但是，调查的目的首先是看这是不是一起谋杀，或者是否有人有直接的责任。如果确定是一起自杀事件，公安局就不会再过问了，除非随后会有什么恶性的纠纷。“因为自杀不是公安局职权之内的事。我们无权过问。”

公安局和医院之所以让我失望，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能帮我找到自杀个案。从他们的档案里，我已经找到了很多线索。他们让我真正感到疑惑的地方是，“自杀”，似乎是地方政府逻辑之外的一件事。公安局和医院都可能和自杀发生关系，这是因为自杀往往和谋杀或疾病相关。公安局之所以会处理一些自杀问题，是因为自杀与谋杀经常搅在一起，分不清楚，医院之所以会处理自杀问题，是因为自杀者往往需要身体或精神的治疗。他们所关心的，都不是自杀本身。

而且，这也不是因为这两个单位玩忽职守或没有尽到责任，而是因为，自杀这样的事，就是在任何公共机关职权之外的事。在中国的地方政治里，没有一个单位



的职权会包括自杀这一项。不管自杀，恰恰是因为这两个单位“行不出其位”，忠实地履行着它们应尽的职责。

因此，当我试图从地方上找到自杀率的统计的时候，完全徒劳无功。县里有人口的数字，也有每年出生和死亡的数字，但就是没有自杀的数字。为什么和怎样记录自杀的数字呢？谁来负责做这件事呢？

这个现象马上又提醒我们，费力鹏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极为明显的问题：他说中国的自杀率至少从1995年就这么高了，我们怎么就不知道呢？不仅不知道，好像还毫无感觉呢。更重要的是，这么高的一个数字，怎么好像根本就没有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没有影响到安定团结呢？

民间传说，自杀而死的鬼是最可怕的鬼，因为他们郁积了满腔的忿戾之气，四处游荡，找不到替身就无法投胎转世。但是，现在中国的这些冤魂，似乎并没有找什么替身，反而是无声无息地就被大风吹走了，活着的人仍然若无其事地过日子，根本就没有理会他们的存在。

面对这样的现象，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些自杀学家所提出的问题，是不是从根子上就问错了呢？在中国的政治分类图式里，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自杀这一项，而我们应该把这几十万的自杀者要么分为农药中毒者、安眠